

土地流转不能只爱“大老板”

□赵永平 尽管工商资本下乡种地有一些争议,但不少地方还是偏爱“大老板”。在江南一个农业县调研,两个土地流转个案发人深省。

一个是“大老板”建的大园区。当地两年前引进大资本,流转6000亩土地,建起现代农业园区。园区红外监控、物联网、智能温室,先进技术样样俱全。种的都是高效作物,像铁皮石斛、金线莲,1公斤能卖几千、上万元。另一个是农户种的小果园。几年前一户农民流转本村20亩土地,种起大棚葡萄,虽比不上现代园区“高大上”,但夫妻俩精耕细作,每亩纯收益也有1万多元。

都是土地流转,境遇却大相径庭。大园区成了当地的亮点,各级领导都来参观,各种政策、项目都往这里倾斜,大大小小观摩会也都在这里开,园区门庭若市。小果园那边就冷清多了,没扶持、没项目,想申请贷款都要到处求人,处处遇难。

为何地方偏爱“大老板”?一位干部直言,现代农业要高投入、高效益,建个园区动辄投入

上亿元,地方财力投不了,靠农民干不起,不引进大资本咋办?上级领导来考察,你有再多的小果园,也摆不上台面。可见,在地方政府眼中,小果园根本无法PK大园区。

农民怎么看?大园区的6000亩地,涉及3个村700户的整村流转,合同一签50年。有农民抱怨:“外地老板只顾挣钱,项目再漂亮,效益再高,跟咱农民没啥关系。”“以后一出门,村里的地都是别人的,这还是咱的农村吗?”而小果园的主人本乡本土,跟村里人融在一起,每到过年过节,总要摘点葡萄、买些米面,看看村里的孤寡老人。在村民眼里,小果园不像大园区那么冷冰冰的,更受大家欢迎。

当土地流转成了政府的“面子工程”,难免急于求成,贪大求快。一些地方为了政绩、样板,不惜上规模、垒大户;搞流转土地,都是整村推进,动辄成千上万亩;搞种植基地,一个公司流转全村人的地,村民都没地种。这种一味追求规模的繁荣,只能算是“虚胖”。一个个现代

农业园区建起来,“大老板”富了,可农民没富起来,这样的土地流转有啥意义?有的公司经营不善,撒手跑路,地没人种,租金没人给,农民利益没了保障。

土地流转不是越大越好,政府不能拔苗助长,更不能“大跃进”。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生产绝大多数还要靠普通农户。在许多农村,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土地承担着农民的就业、社保等功能,甚至是脱贫致富的希望,打着现代农业的幌子强行推动土地流转,势必会损害农民利益。

政府该干什么?引导土地流转,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又要尊重农民意愿,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实际等客观条件,实实在在做好服务。出台政策时,要多听听农民的心声,看农民欢迎什么样的主体,哪种流转更接地气、贴近农村实际,就应该多扶持。土地流转,不能只爱“大老板”,给接地气的“小果园”多些阳光,它们定会花果满园。

【分析评论】

经费、技术不足制约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性

近年来,重庆市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去年11月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农村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收运体系,有力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农村环保基础设施滞后、经费来源不足、畜禽养殖污染严峻、运行管理机制欠缺等瓶颈依然突出,专家建议运用市场化手段提升农村环保设施运营管理能力。

□周凯

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成效显著

重庆市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居民点有1300多名村民居住,在该居民点污水处理站,污水收集后经过曝气处理、湿地过滤,水质明显改观,日处理量50吨,同时该居民点分布着十多个垃圾桶,定时有垃圾车收运。村民樊世伦说,以前污水直接排到居住点后面的小溪,溪水黑臭,鱼虾绝迹,“去年,这里修建了污水处理站,管网连接每家每户,如今溪水开始变清,螃蟹也有了。垃圾有车运走,村民随处乱扔垃圾的习惯也开始改变。”

永利村是重庆市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的缩影。2008年重庆开展全国统筹城乡环保试点和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2013年重庆市将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列入重点民生实事,计划到2017年完成2000个村的连片整治。

重庆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突出重点区域和重点内容,将“撤乡并镇后的场镇、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新村和高山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旅游景区、部分建制乡镇所在居民点”作为项目实施的重点区域,同时整合农业、建设、卫生、市政等部门项目和资金,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垃圾、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以及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三治一保”,以解决当前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

据介绍,通过整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提速,已经实现11个区县的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项目全覆盖、19个区县的场镇集中式污水处理项目全覆盖,项目村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60%和70%,村容村貌和生活环境明显改善,到2017年全市所有撤乡并镇后的场镇、1000人以上的农民新村和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将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

污水、垃圾处理常态化仍存制约

已经完成连片整治项目的行政村如何保证污水、垃圾处理常态化?据重庆市环保局介绍,目前前各区县政府将项目村的污水、垃圾处理运行费

用纳入同级财政预算,除渝北、北碚、璧山等少数财力较好的区县对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全额补贴外,多数区县基本级财政适度补贴,收取部分村民污水和垃圾处理费,其余由乡镇自筹。在运营主体方面,除了少数较大规模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由专业公司运行管理外,绝大多数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好后移交给乡镇政府运营管理。

“建设农村环保设施群众是欢迎的,但如何保障运行经费对乡镇来说是一个难题。”云阳县巴阳镇党委书记伍丽君介绍,污水处理站需要人工、电力、管网维修等成本,一年的费用大概至少需要5万元。云阳县环保局副局长李京川介绍,5万元只是保守估计的基本费用,还没有算突发事件、机器换新。2014年重庆遭遇一场洪灾,云阳县不少农村环保设施受损,需要重新修建。“全县约有150个包括污水在内的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县里对每个项目补贴5000—10000元,乡镇运行资金压力较大。”

“谁污染,谁付费”,但向村民收取污水、垃圾处理费很难。云阳县永利村村主任万丹说,污水处理费基本上收不起来,垃圾处理费每户村民收5元钱一个月也只能收几百元。忠县马灌镇副镇长吴宗立介绍,全镇一年垃圾、污水等卫生费能收10万元左右,资金缺口40多万元。

重庆部分乡镇政府招聘了一些环卫工人负责污水、垃圾设施的运行管理,去年重庆市在所有乡镇成立了环保机构,也承担一部分监管职责。“污水设施的运行比较专业,小型人工湿地的植物需要定期收割,几年之后需要更换,有的污水处理站还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乡镇一级政府缺乏技术支撑。”忠县白石镇副镇长王铁牛说。云阳县环保局副局长李京川介绍,农村环保设施管理人员不够专业,虽然对乡镇招聘的管理人员进行了培训,但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工资低,管理人员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只能起到基本看守作用。“乡镇负责的运行机制虽然建立了,但还需要进一步负责。

运用市场化手段治理农村污染

一些基层干部担心,目前农村环保设施还不算多,乡镇还可以承担,随着农村环境环境连片



整治的推进,项目越来越多,乡镇恐难在经费、技术上保证设施运行。此外,由于这些环保设施规模小、工期要求短,不少项目没有用地指标,且获得用地指标审批手续时间长,只好租用农民土地进行建设。一些基层环保干部介绍,一些失地农民要求得到较高的补偿,在项目选址上存在困难,农民阻碍工程建设时有发生,以前乡镇对于建设农村环保设施积极性很大,现在有些乡镇不愿意建了。

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教授介绍,目前已经有一些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由于经费不足出现了无人管护的现象,他认为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和治理力度,但仅靠行政主导政府难以承受巨额投入,应发挥市场化手段,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入运行主体。

为解决政府环保投入不足的问题,重庆市今年6月成立了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和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创新环保领域投融资机制。重庆资源与环境交易所将建立全市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平台,降低交易成本,把城乡污水、废气、垃圾纳入交易范围,为农村环保提供资金;重庆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将利用10亿元基金杠杆,实现40亿—50亿元资本投入生态环保领域,支持环保产业项目做大做强;针对乡镇污水处理厂等农村环保设施投入大、管网建设滞后、技术落后等问题,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以PPP模式推进农村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平。

谢德体教授表示,千百年来我国农村污水、人畜粪便等都是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无害化利用,但是由于农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减少,农村废弃物难以得到循环利用。受访基层干部建议,应大力发展循环产业,实现污水、人畜粪便还田,促进废物“资源化、商品化、减量化”。同时加大农村污水、垃圾处理成本核算,公开使用信息,可通过水电代收的方式收取污水、垃圾处理费,对于贫困户给予减免,提高地方财政补贴力度。

品类及农业产业链条的薄弱环节,创建自有平台,重点打造涉农信息平台和粮食交易所。

“互联网+”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电商平台以及本地互联网商家的鼎力协作。政府应充当教练员和啦啦队的角色,做好顶层设计和规则制定,构建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区域品牌,树立典型和政策扶植。各级领导要成为跨界界的专家,既懂农业又了解互联网,还要有全产业链的思维,克服本位观念。培育建设农村互联网经济体系和信用体系,形成以各类合作组织、工商企业和农村能人牵头,带动全体农民共同发展的“互联网+”农业之路。(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育种家评价机制要强化正能量

——由屠呦呦获诺奖想到的

□宋逊风 近日,欣闻我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闻者无不为之振奋!但是,颇令人遗憾的是,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却未获通过,被称为“三无科学家”:一无博士学位,二无留学经历,三无院士头衔。

能获世界科学界最高奖项,却评不上院士,此事看似笑谈,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院士评审机制的弊病。无独有偶,在对育种家的评价方面也存在类似现象:时代楷模、“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研究员,曾于1999年、2011年先后两次由山东省相关部门推荐参评中国工程院院士,最终也未能入围。

李登海研究员致力于高产攻关40余年,率先提出并确立了我国紧凑型杂交玉米的育种方向,开创了中国玉米高产道路,破天荒地选育出五代90个紧凑型杂交玉米,七次创造我国夏玉米高产纪录、两次创造世界夏玉米高产纪录。他育出的玉米种子种植面积曾占全国总面积的1/3,创出了一亩地养活4.5人的奇迹,为国家增加社会效益1200多亿元。今年7月,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亚太区杂交玉米育种高级专家威尔逊称李登海是当代“中国杂交玉米(紧凑型)第一人”。

笔者认为,李登海在确立我国紧凑型杂交玉米高产育种方向的科研成果和提高全国农业产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上的重大贡献远远超过了院士的评审条件。

莫忘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院士评审机制上,特别是工程院院士的评审,尤其应当遵循这个标准。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即或SCI论文发表得再多,也是空洞、无用的理论,丝毫无益于国家和人民。

除此之外,在育种家的职称评审方面也存在某些弊病。15年来,“郑单958”玉米新品种以其高产、广适、多抗、优质的优良特性为全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该品种的第一、第二完成人堵纯信、张发林于2008年1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然而,堵纯信仅是副研究员职称,张发林仅仅是助理农艺师(初级)。原因均是由于“编制”所限,当地评审部门未予评为正高和中级。两位育种家的职称与其对国家的贡献、获得的国家大奖极不相称。此种职称评审,不仅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利于激励和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就全国科研单位和种业界来看,能够育出像“郑单958”这样的大品种、获国家大奖的正高及中级职称的育种家简直凤毛麟角。

评审机制是否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仅关系到对科技工作者的成果、贡献的评价问题,也有一个导向作用。究竟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呢?

日前,笔者连续参加了玉米育种和栽培的两个学术研讨会,听取了全国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及博士的学术论文报告,其中有相当一些研究者的论文并不是从农业生产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报告会上笔者问一位做报告的博士:“你所报告的论文与农业生产有什么关系?起什么作用?”博士无言以对。报告会后,笔者随机问起几位青年学者:“论文为什么会脱离我国农业生产实际?”得到的回答是:评职称、发论文使然。

如此评审机制,像屠呦呦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甘于寂寞、专心科研的科学家评不上院士也就不足为奇了。鉴于此,亟待改革评审机制,现已势在必行。